

# 遺大投艰集

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下)

陈春声 刘志伟◎主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遗大投艰集

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下)

陈春声 刘志伟◎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上、下）/陈春声，刘志伟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18-08498-5

I. ①遗… II. ①陈…②刘… III. ①梁方仲（1908—1970）-纪念文集  
IV. ①K825.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2135 号

YIDATOUJIANJI: JINIANLIANGFANGZHONGJIAOSHOU DANCHEN YIBAI ZHOUNIAN

## 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陈春声 刘志伟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柏峰 张贤明 陈其伟 李展鹏

装帧设计：新角度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8498-5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74.5 插页：6 字数：120千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020-83791487 邮购热线：020-83795749

## 题 记

本集之书名出自《尚书·大诰》，其文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孔安国传：“我周家为天下役事，遗我甚大，投此艰难于我身。”梁方仲先生曾于病榻中赋诗用此典以表其心志云：“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在梁方仲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于 2008 年 11 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 100 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鸿儒硕彦聚首一堂，缅怀先生业绩，发表研究心得。先生当年以一迂公之身，艰难开造之天役，于此盛会得见其大观。会后，承蒙与会学者惠赐大作，俾编次成帙，遂借“遗大投艰”题书名，以表吾辈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天役，不袭因循，独立艰行之矢志，慰先生于天国，传香烟于后来。信作者诸君，皆心同此愿！是为记。

——编者

## 《遗大投艰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梁承邨

主 编：陈春声 刘志伟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春声 董志凯 戴 和 黄启臣 李伯重

李龙潜 刘志伟 杨生民 叶显恩 周秀鸾

编辑助理：周惊涛

# 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

——试论 18 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

陈春声 刘志伟

## 一、问题的提出

16—18 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及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商品货币交换空前发达的现象，一直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课题。梁方仲教授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研究的学者，1939 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sup>①</sup> 利用中外历史文献，对明代输入白银的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作了具有奠基意义的研究。他在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赋役与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深入考察了在白银流入与商品流通发展背景下政府财政体系转变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提示了这样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sup>②</sup> 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商品流通的发达，但商业这种“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导致手工业、农业同步发

<sup>①</sup> 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6 卷第 2 期，1939 年 12 月。

<sup>②</sup> 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4 卷第 1 期，1936 年 5 月；《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岭南学报》第 12 卷第 1 期，1952 年。



展。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梁方仲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繁荣”。<sup>①</sup>

近几十年来，关于16世纪以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及其影响的研究，是以市场运作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为主导的。研究者大多将白银流通置于近代经济学和近代货币学的模式中加以理解，重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扩展背景之下的国际贸易格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关注白银流通量增加对物价变动、市场整合、商贸繁荣、市镇兴起等经济问题的影响，在这样的分析逻辑中，白银被视为一个整合程度日益完善的国内市场的内在要素之一。一方面，白银的大量输入促进了16世纪以后中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迅速扩展的市场经济又产生了对白银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分析架构之下，有一个问题长期让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感到困惑：以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18世纪中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程度与同时代的欧洲基本持平，为什么中国未能像欧洲一样，依赖自身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sup>②</sup>

近年来，因为标榜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著作的出版，<sup>③</sup>如何在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之下，原产于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方面，重新引起许多讨论和思考。在梁方仲教授学术思想的启示之下，本文从与制度和物质生活相关的角度，将18世纪美洲白银在中国的流通，置于“贡赋经济”的运作中考察，从一个侧面对如何理解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取向这一重要问题做出回应。

① 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参见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参见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彭慕兰著，邱澎生等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

## 二、16世纪中国货币财政体制的形成

梁方仲教授在1936年发表《一条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就以精辟的语言，指出一条鞭法赋税制度与因国际贸易引起的白银货币流通发达的关系：

从公元十六世纪，我们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这里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的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股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明代自十六世纪初年正德以后，国内的农工业的生产方法及生产关系，虽然没有重大的变化，但因历史上的机缘，如西洋航海术的进步等，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却逐渐兴盛起来，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形亦逐渐从自然经济时代发展到货币经济阶段上去。一条鞭法用银缴纳，不过是当时大潮流中的一条旁支。但除去用银一点足令我们注意以外，一条鞭法还有种种在赋法与役法上的变迁，与一向的田赋制度不同。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的结构。<sup>①</sup>

这一论述，不但指出一条鞭法下田赋缴纳以银子为主体，是由于贸易发达导致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同时也提示我们，由于一条鞭法的施行，市场流通的白银货币，大量被吸纳到贡赋经济的运作中，其直接的后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财政体制。<sup>②</sup>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国家体制，一开始是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的。朝廷和中央政府机构的财政来源，绝大部分来源于实物田赋的直接输纳：庞大的军队供应，尤其是北部边防和其他沿边地区的防卫供给，依赖屯田和本质上属于实物财政体制的开中制度；各级官手工业不仅直接为宫廷和各级政府制造各种物资，其所用原材料也直接来自各地的实物采办；地方政府运作和地方公共事

<sup>①</sup> 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

<sup>②</sup> 参见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务所需的人力和财物来源，甚至地方官员的实际收入，也主要来自里甲供办；国家调控法定货币宝钞的机制，也是如食盐户口制度之类的实物财政手段。这样的实物财政体制，在明代初年国家运作仍然以军事化体制为主、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较为精简的情况下，尚可有效运作。但到永乐、宣德之后，明朝国家的财政运作，越来越依赖货币手段，同时，由于宝钞和铸钱发行与流通存在深层的矛盾，<sup>①</sup> 白银逐渐成为主要通货，政府财政也渐次白银货币化。对于这个过程，在梁方仲先生以后，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做了大量研究，虽然到目前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但明代财政白银货币化之趋势已大致为学界所了解。<sup>②</sup>

明代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除了突出表现在作为中央财政领域的太仓银库的建立以及太仓岁入银两的增加之外，<sup>③</sup> 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是地方财政体系的建立。

在明初的制度之下，州县政府运作所需的日常开销和地方社会公共建设事业，基本上依赖里甲制度下的差役征派，特别是民户轮流到官府服役的安排，地方官员在日常开支和地方建设资源的掌控方面，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临时性，而编产齐民的负担也以劳力和实物的供应为主，因时因人因需而随时变化。一条鞭法改革的过程，以赋税定额化与课税客体划一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州县财政预算的编制。先是形成均平、均徭、民壮、驿传四类差役（通常合称“四差”）分别编派以及上供物料定额编派的预算制度。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四差”中按田粮征收的部分合并起来，再同田赋折银合并，构成所谓的“地银”，而各种差役原来按丁征收的部分亦合并了起来，即所谓“丁银”。所以，“丁银”是实行一条鞭法的结果。从明末至清代雍正年间，经过丁银按田地征收和丁银与田赋合并征收等阶段性演变，“摊丁入地”得以完成。由此形成了一个

---

① 参见张瑞威：《一条鞭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明代研究》2007年第10期，第123—139页。

② 参见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对明代财政白银化的综述讨论。

③ 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1972年12月，第163—455页。

以白银货币为计算和支付手段的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在这个体系下，银子成为赋役征派的主要手段，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和相互间的财政关系，一律以白银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和支付物，使本来互不相同的赋役项目有了统一的计算和支付手段，州县财政制度由此得以建立起来，从而改变了传统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朝廷的关系。<sup>①</sup>

一条鞭法以折银取代亲身应役制度，在编产齐民与王朝政府之间，更多通过货币方式来联系。这样的变化，反映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划地为牢”、与百姓亲身应役的安排密切关联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人口空间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增强。但与此同时，一条鞭法也意味着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的加强。在一条鞭法制度下，官与民的关系，尤其是在官民之间的富人（乡绅）与胥吏一类中介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加强的新机制。<sup>②</sup>

从16世纪初开始，经过约200年的演变，到18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赋役制度终于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不能说这次影响深远的赋役制度变革是由于国外白银输入所引致的，但可以讲，如果没有数以亿两计的来自国外的白银的挹注，这次以定额化和折银化为重要标志的改革，也绝对没有实现的条件。如果16世纪实行一条鞭法之时，来自日本的白银在中国的白银流通中尚有较大份额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当“摊丁入地”自下而上逐渐展开并最终完成的时候，在中国流通的主要是来自美洲的白银。<sup>③</sup>

由于16—18世纪的赋役制度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也就使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据黄仁宇的估算，

① 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236、174—185页。

② 参见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③ 参见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第18—15页；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第81—91页。



到1600年以前，全国田赋正额总值略高于2100万两，差役银约1000万两。<sup>①</sup>由于他估算田赋正额数是根据每石0.8两的折银率推算的，而且包括了本色在内，而实际上南方很多州县田赋的平均折银率低于0.8两，加上还有一些地方的田赋一直维持部分征收本色，所以，实际上田赋正额的白银货币收入应该少于2000万两。但是，黄仁宇对差役银的估算则偏低，吴承明根据唐文基辑录的数字推算，估计里甲、均徭两项的役银共约2280万两。<sup>②</sup>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是差役银中还有数额颇大的驿传和民壮两大类，把这两大类计算进来，差役银当超过2000万两。另外，在明代中期，还有一项负担甚重的征派，一股统称为“上供物料”，这项征派有些地方归入“赋”中，有些地方则归入“役”中，作为差役中的里甲（均平银）的组成部分，也有很多州县是在赋与役之外另行派征的，若把这一项征派计算在内，我们估计明代后期的赋役派银高达4000万两左右是完全可能的。明代后期的财政收入中，除了两税和差役之外，还有几项重要的白银货币收入，其中如盐课有130万—200万两，<sup>③</sup>明末的三饷加派最高达1000多万两，即使以泰昌元年（1620）定为岁额的辽饷计算，已高达520万两，<sup>④</sup>此外还有钞关、税监、开纳、赃罚，等等，总计也在数百万两以上。据此，我们比较谨慎地估计，在明代末期，每年被吸纳进财政运作中的白银货币高达四五千万两。

也就是说，与明代前期不同，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来自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这些白银通过市场流通，被吸纳到财政运作体系中，又通过财政支出和国家与官僚队伍的消费，再进入市场流通，成为拉动市场的一种主要力量。财政白银货币化不但成为明代

---

①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75.

② 参见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见《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③ Ray 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pp. 214-216.

④ 参见《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3页。

货币流通迅速发展的一個动因，更由此使贡赋体系成为白银流通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弗兰克认为，1400—1800年“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sup>①</sup> 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的是“白银的世界性流动”对于18世纪的中国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进入朝廷和各级衙门运作过程的银子，是通过一套严密、有效，在具体实施时颇能迁就地方实际情形的赋税征收制度而被吸纳起来的。这就是说，在讨论18世纪美洲白银在中国流通的真正“意义”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其“贡赋经济”的背景。

### 三、白银的意义：为何18世纪中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

关于18世纪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规模，因为所依据材料和论述指向的差异，以往研究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林满红教授在《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中的统计，1721—1740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为6800万元，1752—1800年为10500万元。<sup>②</sup> 即前20年间，平均每年输入340万元，约折合250万两；后49年间，平均每年输入214万元，约折合154万两。若将有统计数字的这69年合并计算，则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80万两。

全汉昇1957年发表的《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估计，1700—1830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5亿元。其中，欧洲各国到广州贸易带来4亿元；从墨西哥跨越太平洋运到西属马尼拉，再由中国商人转运到中国内地的白银约1亿元。在该文中，全先生接受了德科民（De Comyn）的一个估计数，相信1571—1821年从墨西哥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有4亿元，其中1/4流到中国，即1亿银元。<sup>③</sup> 1970年全汉昇先生发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一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93页。

② 参见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见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第11页。

③ 参见全汉昇：《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第503—504页。



文，认为他所接受的德科民的估计值偏低，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墨西哥流入马尼拉白银总数的 1/2，即 2 亿元或更多一些。<sup>①</sup> 据此，全先生估算的 1700—1830 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 6 亿元，折合约 4.3 亿两。<sup>②</sup> 据此计算，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 330 万两。这个数字比林满红的统计多了将近一倍。

而弗兰克则认为，在 1800 年以前的 250 年中，中国大约获得 60000 吨白银，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sup>③</sup> 60000 吨白银约合 19.2 亿两，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 768 万两。这个数字比全汉昇先生的估计又多了一倍。但弗兰克的估算，是根据他所理解的 16—18 世纪全球贵金属流通的大格局所做出的，缺乏具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做依据，似乎有过度高估且结论先行的瑕疵。

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的输入曾在欧洲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物价革命”。转过来观察中国的情况，18 世纪中国的物价也确有上升的趋势，全汉昇先生还曾经将该趋势称为“18 世纪中国物价革命”。<sup>④</sup> 不过，全先生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大内档案中的雨雪粮价折还未能研究者所利用。最近 20 年，多位学者利用这些档案中数以百万计的米价数据，以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更细密的计算，研究表明，把这 100 年间的物价上升称之为“物价革命”，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克的描述大致反映了最近 20 年来研究者的一股看法：

生产和人口都增长了，但新增的货币并没有使物价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马立博和陈春声发现，甚至在高度货币化的中国南方，除了个别的米价飞涨时期外，在许多世纪里，米价的上涨是与人口增

---

① 参见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440—446 页。

② 墨西哥银元 1 元约折合 0.72 库平两。

③ 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208 页。

④ 全汉昇：《美洲白银与 18 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475—508 页。

长紧密相关的，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趋于下降。<sup>①</sup>

陈春声曾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数千份清代粮价单和雨水粮价折，结合文集和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研究 18 世纪广东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其工作表明，18 世纪广东确实出现了温和的物价上升趋势，100 年间该省米价上涨了约 70%，康熙四十六年（1707）全省年平均米价为每石 0.81 两纹银，嘉庆五年（1800）这个数字则为 1.376 两；<sup>②</sup> 而同时期广东人口的年增长率在 5.7—11 之间，平均约 6.8，刚好是 100 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sup>③</sup> 也就是说，米价上升的幅度可能小于人口增长的幅度。同一时期米价的上升自然也伴随着其他物价的缓慢上升，所谓“其他商品的价格则趋于下降”并不确切，但物价的上升幅度低于人口的增长幅度，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陈春声的研究也证明，当时物价上升对因租佃关系而形成的分配关系影响不大，也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219 页。文中所引马立博和陈春声观点，见 Robert Marks, Chen Chunsheng, *Price Inflation and Its Social, Economic, and Climatic, and Climatic Context in Guangdong Province, 1707—1800*, T'oung Pao, 1995, Vol. 81, No. 1。

② 这是简单的算术平均数，即对一年中 12 个月各府州上米、中米、下米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算数平均的结果。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年修订版，第 155—157 页。

③ 乾隆四十一年（1776）前后中国人口数有巨大差别，这是因为人口统计方法的不同造成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前的人口统计为“编审人丁”数，编审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二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一人交纳钱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025 页），而且地方官员将此视为例行公事，凭空杜撰，毫无准确性可言。乾隆三十七年各地接到通知“编审之例，无裨实政，永行停止。”（乾隆《揭阳县志》卷三《赋役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 29 册，上海：上海书店，2003 年，第 302 页）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的人口统计为“保甲烟户”数，根据规定，“督抚饬所属按保甲门牌册实在民数，岁以十月同谷数造册送部”（嘉庆《大清会典》卷一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32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546 页）。这一做法没有制度上的缺陷，其可靠性取决于州县官员的认真程度。就广东的情况而言，该时期的人口统计仍然带有任意推测的成分（参见 Ping 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52），但比以前的编审数要可靠得多。以上的全省人口年均增长率，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1776—1791）户科题本和朱批奏折的相关数字折算出来的。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 21—43 页。



未改变赋税交纳者与官府的关系，实际上靠赋税和各种加派为生的官吏的生活水平并不因物价上升而下降：物价上升使大量货币财富集中于商人之手，使商人成为在这场价格变动中获利最大的社会集团。总而言之，当时这种温和而缓慢的物价上升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sup>①</sup>

问题在于，弗兰克认为 18 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却未产生明显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商品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货币需求，从而抵消了白银流通量增加对于物价上涨的压力“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加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sup>②</sup> 王国斌在为《白银资本》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列“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 世纪和 18 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sup>③</sup>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这种完全从形式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的分析，并未能恰如其分地反映 18 世纪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改革之后，当时中国的确“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不过这种渴求更重要的缘由，可能在于国家财政制度和官僚体制运作对白银越来越严重的依赖。18 世纪全国地丁银征收总额为 3000 余万两，其中起运近 2400 万两，存留近 700 万两；<sup>④</sup> 18 世纪中叶全国盐税约 550 万两，关税约 430 万两；此外，朝廷每年可以通过捐监得到约 300 万两银子，此外，还有茶税、芦课、鱼课、落地税、契税等项杂税，以及捐官的收入（2004000 万两之间）。<sup>⑤</sup> 百濂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文中列举了乾隆三

① 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 154—161、187—196 页。

②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220 页。

③ 王国斌：《白银资本》序言，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 13 页。

④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420—421 页。

⑤ 参见王业键：《清代中国的财政制度》、《清雍正时期（1723—1735）的财政改革》，见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一），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 年，第 287—302、303—339 页。

十一年（1766）朝廷的岁入：地丁 3291 万两（含耗羨），盐课 574 万两，关税 540 万两，杂税 142 万两，捐输 300 万两，合计 4847 万两。<sup>①</sup>也就是说，18 世纪中叶清王朝每年财政收入获取的白银高达近 5000 万两。这个数字是根据林满红统计计算出来的每年白银进口数的 28 倍，是全汉昇估算数的 15 倍，弗兰克明显偏大的占计数的 6.5 倍。

上述数字只是账面上朝廷所得到的财政收入。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火耗、秤头、加派、规费等等名目层出不穷，相关记载举不胜举。实际进入官僚体制的白银要远多于此数。

百瀚弘在同一文章中，也详细列举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廷的岁出：（1）兵饷 1700 万两，（2）王公文武官员俸银 94 万两，（3）藩部王公俸银 128000 两，（4）文武官员养廉银 427 万两，（5）中央官署属吏雇员俸给 83000 两，（6）中央官员津贴 14 万两，（7）宫廷、中央官署的营造、典礼、对外事务等主要经费总额 56 万两，（8）宫廷、中央官署家畜饲养费 83000 两，（9）宫廷、中央官署器材费 12 万两，（10）藩部、朝贡国使节赏赐费 1 万两，（11）织造费 14 万两，（12）铸钱材料费 12 万两，（13）漕运支出 120 万两，（14）北京赈恤费 3000 两，（15）治水费 380 万两，（16）地方一股官衙经费（驿递、典礼、赈恤、官署事务、属吏雇员薪俸等）600 万两，合计 3459.7 万两。<sup>②</sup>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岁出最主要的开支是养兵的费用，占其总支出的一半以上。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上《八旗屯种疏》，也谈到同样的情况：

窃惟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之供。惠养深仁，当豫为长久之计。臣奉恩命简佐农部，详查每年经费出入之数。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

<sup>①</sup> 参见百瀚弘，郑永昌译：《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第 817 页。

<sup>②</sup> 参见百瀚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第 802 页。



绿旗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是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sup>①</sup>

根据以上的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667）朝廷岁入4847万两，岁出3459.7万两，相抵之下，似乎每年可以有1000余万两的节余。不过，实际的情况没有如此乐观，上引有关岁出的统计并不完全，例如下节将要提及的每年产部用于采买和运输滇铜的100万两银子，还有各地钱局采买滇铜的费用，都没有出现在“岁出”的统计中。但无论如何，18世纪清朝的国库基本上是“府藏充实，国用富饶”的。乾隆后期大学士阿桂上《论增兵筹饷疏》，描述了康、雍、乾三朝国库积藏的情况：

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而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我皇上御极之初，产部库项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加增赋税，而府藏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两。<sup>②</sup>

部库积藏了7000余万两白银，意味着相当于21年中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假如接受全汉昇先生的估算）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理所当然地也被作为物质财富，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和其他豪势富产所囤积。仅以18世纪最后一年被抄家的和珅为例。关于和珅家产数目的说法悬殊不一，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占计有2.3亿两白银，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引《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材料，则认为和珅的家财不下8亿两白银。根据清代大内档案《和珅犯罪全案档》的资料，<sup>③</sup>和珅抄家时共有白银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sup>④</sup>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5460余两、洋钱58000元（占银40600两）。据此计算，和珅家收藏的货币形态的白银已达约1000万两，相等于全汉昇先生占计的3年多的

① 梁诗正：《八旗屯种疏》，《清经世文编》卷三五《户政十·八旗生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67页。

② 阿桂：《论增兵筹饷疏》，《清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一·理财上》，第647页。

③ 参见冯佐哲：《〈和珅犯罪全案档〉考实》，《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

④ 参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作“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页），似更可信。